



联邦德国战后的史学反思^{*}

——评孙立新等著《联邦德国史学研究》

王 琳

一般认为,联邦德国(后文简称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和日本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深度方面,相较日本,德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积极评价。但实际上,二战后,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充满变数。特别是在德国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不仅伴随着战后的史学发展,也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史学的研究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和范丁梁的《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版)一书,从德国政界的历史反思入手,依托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德国战后几次规模较大的史学争论。该书考察了德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展现了政治与史学的相互关系以及德国史学研究与其战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

该书从结构框架上分为德国政界的历史反思、德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六次史学争论三部分。从德国政治到史学演变再到具体的事件,该书的整体内容逻辑层次明晰,视阈宽泛,史料丰富,系统地梳理了德国战后社会中反响较大的六次争论,突出了德国史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德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该书第一章解读了德国政界占领时期的自我批评和辩解、重建时期的有限反思、20世纪六十年代的重突破和之后历史反思的逆转和守望。在20世纪60年代“抗议一代”的作用下,德国政治家逐渐承认了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20世纪70年代,德国社民党—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大力推进了正视和反思历史的进程,借用“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来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最终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认可,并成为“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①但随着1982年以科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上台执政,保守主义在政治上重新抬头,以“正常性”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开始着力渲染德意志历史中的积极方面,以期年轻一代的德国人重塑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②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视阈下战后德国文化记忆变迁研究(1945—2000)”(18SBB006)的中期成果。

^① D. Langewiesche, Über das Umschreiben der Geschichte. Zur Rolle der Sozialgeschichte, in: Ders., Zeitwende. Geschichtesdenken heute. Göttingen, 2008, S. 56–58, hier S. 61.

^② 参见 Rupert Seuthe, „Geistig-moralische Wende“? Der politische Umgang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in der Ära Kohl am Beispiel von Gedenktagen, Museums- und Denkmalprojekten. Frankfurt a. M. 2001; Sabine Moller, Die Entkonkretisierung der NS-Herrschaft in der Ära Kohl. Hannover, 1998; 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执政”》,《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又刺激了德国右倾的政治思潮。随着 21 世纪全球性记忆思潮的兴起和大众记忆文化的逐步形成,一股以反思纳粹主义和大屠杀为中心的“记忆潮”在德国政界兴起。

德国政界的纳粹历史反思引起历史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所以该书的第二章围绕德国战后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展开。包括二战后史学的重建、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史学多元化。战后,德国历史学界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历史学家和具有左翼改良主义色彩的民主派历史学家之间的对抗。民主派历史学家反对为法西斯辩护,谴责军国主义,主张“同过去全面决裂”。其中以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最为著名,在他的影响下,德国史学从传统历史主义开始转向“新实证主义”,从“客观主义”开始进入历史反思,从价值中立开始进行自我批评。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西方史学演变的影响,社会史研究开始在德国兴起,这是德国史学理论方法上的重大变化。而史学研究的转向、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经济的滑坡、社会矛盾的凸显也使批判的社会史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 1973 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一书中,提出了批判性“德意志道路”的命题,进而引发了一场重要的史学争论。^①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史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史学界左右派的对抗和争论却愈演愈烈。其中以“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代表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最为出名,他不仅对纳粹历史进行了修正主义的阐释,而且为纳粹罪行的相对化提供了多种“理论方法论”依据。^②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战后的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对希特勒的行为公开表示谴责。近年来,德国全球史学派应时而生。该学派跳出了民族和国家的框架,提出“跨民族研究”,从全球性的角度,来论证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政治立场,从而为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德国政界的历史反思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使有关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持续不断。该书第三章到第八章,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对战后德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六次争论:20 世纪 60 年代的“菲舍尔争论”、20 世纪 70 年代由《德意志帝国(1871—1918)》所引发的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争论、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20 世纪 90 年代名为“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的公众史学争议、“戈德哈根辩论”,以及贯穿于战后至现在关于“1940—1945 年盟军大轰炸”的争论。这些争论涵盖了以菲舍尔为代表的德国民主派历史学家对于普鲁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复仇主义之间继承性的揭露;以韦勒为首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角度对纳粹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对传统“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批判和重新解读;左派改良民主派历史学家与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包括一些右翼极端主义者在“道德化”批判和“去道德化”辩护之间的博弈和争斗;美国学者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与德国历史学家在德国媒体和公众领域就“德国文化中是否普遍存在反犹主义”的争论^③;反法西斯同盟在大轰炸中的过失是否可以减轻或冲淡纳粹德国罪恶的思考。从内容上看,这些争论的发生与德国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界内部的左右两派持久分裂密切相关,但争论的本质凸显了德国人擅长用批判自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德国历史学家对于过往事件的细致研究和深入讨论,为德国人加深对本民族的认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塑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 6 Auflage. Göttingen, 1988.

② Michael Schneider, “Volkspädagogik“ von rechts: Ernst Nolte, die Bemühungen um die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selbstbewußte Nation“, Bonn, 1998.

③ 参见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该书最后附录了两篇文章:《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史叙述》和《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初探——以“德国民族民主党”为中心》。在德国,作为政治文化变迁产物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关于二战的叙述反映的是一种“装载着规范期待”的记忆文化^①,不仅以承认集体罪责作为前提,而且着重论述了罪责分层化、消融化、当下化和立体化。第二篇文章则以“民族民主党”为例,介绍了德国极右政党,称未来德国右翼极端势力的兴起也是绝不能忽视的。

孙立新等人在书中也提到,史学争论的反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国内对纳粹罪行的认识仍旧存在争议,右翼极端势力的危害依然严峻。如何从民族主义的根源上去解读纳粹历史,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在德国政界还是史学界的反思中,传统民族主义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二战战败,极端民族主义消解,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开始在德国兴起,但这种反思绝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之所以对纳粹历史采取排斥和缄默态度,是因为他们希望借由对历史的禁忌来保全其文化民族主义的荣誉性;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普世价值的传入、学生运动的兴起、批判史学的出现,民族主义国家的个性也开始变弱,对大屠杀和纳粹历史也不再采取排斥和逃避的态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开始认同自己超越民族的民主政治新秩序。但同时,对德国历史“正常化”的重新定位,使得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趋于平淡化;两德统一后,新的民族认同也随之产生,对大屠杀的历史叙事也发生了改变。到了21世纪,全球性记忆和大众记忆文化的兴盛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社会,德国人逐渐把对纳粹历史和大屠杀的反思放在了历史回顾的首位。总而言之,随着战后民族主义的阶段性演进,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这些转变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以一种复杂和相互交织的关系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德国战后整体的反思过程。

相比德国政界和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日本政界中的右翼势力公然否定整个侵略战争的性质,同时日本社会关于“日本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言论此起彼伏。这个问题本质上和德国关于盟军大轰炸的争论是一样的,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并不能冲淡和取代作为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责,而应该更多地探讨两重身份转化之间的原因。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过:“我们不要再只是觉得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但也是罪犯……我们在50年中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②

诚然,德国对于历史反思也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建立与欧洲各国友好互信的合作关系,是德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与东亚各国的交往在其外交政策中并不处于首位,故而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也缺乏相应的必要性和现实性。^③但实际上,对于自身历史的反思和认识,其最终目的并非是赢得别国的认同和肯定,而是获得对自身民族的认识和身份认同。漠视、回避,甚至否定一段自身民族羞愧的历史远远不如接受它来的更有价值。只有明智的民族和国家才真正清楚,放下历史包袱,实现自身救赎,才能坦然地面向未来。

[作者王琳,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弗里德里希·耶格尔、约恩·吕森著,孙立新译:《德国历史中的回忆文化》,《书写历史》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4页。

② 德国《明星》画刊(Stern),1995年6月22日,转引自郭梁《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③ 李乐曾:《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德国研究》1997年第2期。